

试论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分布及物资流向

吕 岩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唐朝政府购买物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北方(东北、西北)边境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岭南地区,呈现出以关中为中心,东南、西北并重的局面。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流向,主要有购买地本地使用、购买地—长安、购买地—边境或战场三种类型。政府购买物资的运路流向主要有两种:入京物资既充分利用漕运路线,又利用长安附近发达的陆路交通运输线;非入京物资的转运则利用了唐代全国各地发达的水陆交通线和完善的仓廩系统。

【关键词】唐朝;政府物资购买;地域分布;物资流向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3-0041-13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Purchase in Tang Dynasty

LV Ya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 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Abstract: Limited to the natural conditions, government purchase of Tang Dynasty with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mainly concentrate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north, (northeast, northwest), in middle and lower area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Yangtz River and Huai River area, the southern area. The flow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may be for the local use, or transport to Chang'an, border or battlefield.

Key Words: Tang Dynasty; government purchas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low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自20世纪初唐代财政史研究兴起以来,和籴、和市、宫市、财政机构的职能与运作等,成为唐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果^①。但从总体上看,对唐朝政府物资购买所作的整体性探讨还比较薄弱。本文试就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分布特点作浅显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收稿日期】2015-09-04

【基金项目】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5RCJJ039)

【作者简介】吕岩(1979-),男,博士,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① 学术界关于和籴制度的探讨,集中在和籴制度的渊源、作用、实施区域、有无强制性以及和籴与常平的关系等方面,相关学术史可参考李锦绣:《财政·和籴》,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02-404页。台湾学者罗彤华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唐代和籴的管理体系、功能与运作方式、籴本的来源与演变、和籴与商业的关系等,见罗彤华:《唐代和籴问题试论》,《新史学》2004年第1期。对唐代和市、宫市的研究,以注重出土材料的运用和强调和市、宫市的暴力掠夺性为共同的特点。宁欣先生进一步关注到唐代宫廷与市场的紧密联系,见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对唐代市场的研究,从研究唐代市场自身的发展变化,逐渐深入到关注政府对于市场、工商业的管理机制及其变迁。如李文海:《唐代的商业与商品》,《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武复兴:《唐长安的市场和商业》,《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

一、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主要区域

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唐代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政府购买物资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主要集中在关中、北方(包括西北、东北)边境、黄河中下游、江淮、岭南,呈现出以关中为中心,东南、西北并重的局面。

(一)关中地区

关中是唐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政府购买物资的核心地区。关中诸州是唐朝政府购买粮食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区域,和市、宫市也主要集中在京师长安。此外,政府购买木材、草料、建筑材料等,也奉行关中优先的原则。

粮食是唐朝政府购买的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终唐一代,关中在政府粮食购买中占据关键地位。唐朝立国之初,就在关中、河东等地购买粮食。贞观年间,关中和籴发展迅速,并实现了制度化^①。高宗永徽六年(655),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显庆二年(657),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开元七年(719),关内、陇右、河南、河北、河东五道及荆、扬、襄、夔等州,普遍设立了常平仓,并专设常平仓本钱^②。开元二十五年(737),和籴大规模推行于关中,东、西畿购粮各数百万斛;因和籴成效显著,停运当年江淮地区的租米。开元二十九年(741),又在洛阳、长安各和籴数百万石^③。天宝年间,政府每年都在关中和籴,并将诸道和籴的粮食百余万斛输送长安^④。天宝八载(749),关中地区和籴购粮占全国购粮总数的44.70%,常平仓购粮占全国常平仓购粮总数的8.16%^⑤。

期;张泽咸:《唐朝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岳纯之:《关于唐代市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等。将古代政府物资购买作为专题研究,并进行整合性的探讨,主要有李晓:《宋朝政府购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吕岩:《唐朝政府物资购买领域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试论唐朝政府物资购买的制度缺陷》,《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等。此外,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也涉及到政府物资购买的许多侧面,如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张弓:《唐朝仓廩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日]日野开三郎:《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1卷《户口问题と籴买法》,三一书房,1988年;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日]清木场东:《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编》,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年;《帝赐の构造——唐代财政史研究·支出编》,中国书店,1997年等。

①《金石续编》卷4《和籴粟窖砖文四种》:“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街东第二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九窖,纳和籴粟六千五百石。”“贞观廿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大街西从北向南第一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十三窖,纳和籴米四千四百石。”见陆耀遹纂:《金石续编》卷4,《和籴粟窖砖文四种》,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四),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3077、3078页。

②开元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河东〕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见《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中华书局,1955年,第1613页。

③“〔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今岁秋苗远近丰熟,时谷既贱,则甚伤农,事资均籴,以利百姓。宜令户部郎中郑昉、殿中侍御史郑章,于都畿据时价外每斗加三两钱和籴粟三四百万石,所在贮掌。……其关辅委度支郎中兼侍御史王翼准此和籴三百四十万石。”见《册府元龟》卷502,《邦计·平籴》,中华书局,1960年,第6012页。

④“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见《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3-1374页。

⑤见《通典》卷12《食货一二·轻重》,中华书局,1988年,第291、293-294页。

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大规模的粮食购买被迫停废。代宗广德二年(764),第五琦奏请诸州重设常平仓,两年后,开始正式实施,关中地区的粮食购买得以恢复。大历年间,唐朝政府对于关内和京师长安的和籴,始终予以高度关注。“大历八年(773),以关内丰穰,减漕十万石,度支和籴以优农。”^①大历九年五月,“庚申,诏度支使支七十万贯、转运使五十万贯和籴,岁丰谷贱也”^②。终代宗之世,虽然政府多次要求在河南、淮南等道购买粮食,但重点仍在关中地区,成效也最为明显。唐朝政府始终关注关内道和籴,这与当时的边防形势密切相关,其首要目的是保证政府和军队的粮食供应^③。德宗贞元年间,关中连年和籴,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④。为强化京西、北边防线,唐朝还设立了京西、京北和籴使^⑤,以加强对和籴的监管。到唐后期,关内、京西、京北地区仍是唐朝政府购买粮食的重点区域^⑥。

宫廷和中央政府所需的蔬菜,主要由司农寺供给。到唐代中后期,政府购买蔬菜成为司农寺自供的重要补充。德宗贞元七年(791),司农寺因不能按时供给三宫冬藏菜二千车,“奏司农菜不足,请京兆市之”^⑦,这是通过京兆府购买蔬菜,以满足宫廷的需要。德宗曾发布《禁和市诏》称:“其司农寺供宫内及诸厨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其菜价仍委京兆尹约每年时价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⑧文宗大和七年(833)敕文也曾禁止抑配京兆府和市^⑨。可见到唐后期,经常通过京兆府购买冬藏菜,并且实现了制度化。

唐朝实行税草制度,到中后期,中央政府开始在关中地区购买草料。贞元八年(792),裴延龄奏请京兆府以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围送苑中,陆贽指出“缘当年税草支用不充,诸场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阙”^⑩,可见裴延龄以青苗钱买草并非临时起意,唐朝早已实行“诸场和市”的买草制度。

为了满足对薪柴的需要,钩盾署除了组织采伐材木外,每年还从市场上购买木槿,“其和市木槿一十六万根,每岁纳寺”^⑪。除薪炭的供应外,政府大兴土木所需的木材也经常在长安附近购买。

①《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68-1369页。

②《旧唐书》卷11《代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页。

③《全唐文》卷47,唐代宗《命诸道入钱备和果(籴)诏》:“边谷未实,戎备犹虚,因其天时,思致丰积,将设平糴(籴),以之馈军。然以中都所供,内府不足。粗充常入之数,岂齐倍余之收。……每道据合配防秋人数多少,都计钱数,市轻货送纳上都左藏库,贮以纳充别敕和果(籴)用。”见中华书局,1983年,第520页。

④“贞元二年九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华、陕、虢、晋、绛、郾、坊、丹、延等州府,夏秋两税、青苗等钱物,悉折籴粟麦,所在储积,以备军食。京兆府兼给钱收籴,每斗于时估外,更加钱纳于太仓。’诏可之。”见《唐会要》卷90《和籴》,第1636页。贞元三年闰五月,度支奏:“河南、河中府及同、华、晋、绛、陕、虢、郾、坊、丹、延等州今年夏税各送上都及留州、留都府钱八十一万贯,请量取三十万贯折籴豆麦等贮纳,仍委和籴使、兵部郎中姚南仲勾当。”见《册府元龟》卷502,《邦计部·平籴》,第6013页。贞元八年(792)“九月,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备浸充。”见《资治通鉴》卷234 德宗贞元八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7536页。

⑤《唐会要》卷90《和籴》:“长庆元年(821)二月敕:‘春农方兴,种植是切,其京北、京西和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边储无备,请置和籴使,经年无效,徒扰边民,故罢之。”见第1637页。

⑥如穆宗长庆四年(824)八月,“诏于关内及关外,折籴和籴粟一百五十万石,以备饥歉。其和籴价,以户部钱充,收贮,寻常不得支用”。“〔敬宗〕宝历元年(825)八月,敕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沴。”见《唐会要》卷90《和籴》,第1637页。“〔文宗〕大和四年(830)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见《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第2127页。文宗开成三年(838)九月,“诏令户部差官京西、东都、河中共采粟六十万石,各于当处收贮以备水旱”。见《册府元龟》卷502,《邦计部·平籴》,第6015页。

⑦《唐会要》卷66《木炭使》,第1363页。

⑧《全唐文》卷52 唐德宗《禁和市诏》,第566页。

⑨《唐会要》卷66《木炭使》,第1363页。

⑩陆贽:《陆贽集》卷20,《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状》,王素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654-655页。

⑪《唐六典》卷19《司农寺》,中华书局,1992年,第527页。

在畜产方面,关中不是政府买马的主要地区,但唐朝政府有时也会根据需要,在长安附近大规模购买马匹,如德宗建中元年(780),“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①。

在自然灾害或战乱之后,为发展农业生产,政府有时会通过买牛帮助农户解决耕牛缺乏问题。如唐敬宗曾下诏指出:“宜委度支于东镇、武、灵、盐、夏州分市耕牛万头,交付京兆尹,均给畿内贫下百姓。其价以户部绫绢充。”^②

宫廷、政府消费和祭祀用鱼,由都水监河渠署负责供给。“凡诸司应给鱼及冬藏者,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③ 尚食局、中书门下堂厨所需鱼,由都水监组织人力采供。而中央机关各部门所需鱼,则由都水监按时价从长安市场上购买。

建筑业、陶瓷业等官府手工业需要使用大量的土、砂、石灰等,唐朝政府也在关中大量购买这些非金属资源,以保证官府手工业的需要。政府土木建筑所需赤土等,须由右校署适时和市,“其石灰、赤土之属,须则市供,不恒其数”^④。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有时还在关中地区购买轻货。如代宗大历十四年(779),虞部奏:“望令关内州府审勘顷亩,先均给贫下百姓,据厚薄节给轻税五分之一,征纳讫,市轻货送上都。”^⑤ 此外,唐朝政府有时还通过大规模购买绢帛,以稳定中央财政,应对日益严重的货币问题。宪宗元和八年、十二年,曾各出钱 50 万贯,购买布帛,来应对布帛渐轻,现钱减少的问题,提高货币流通量。

此外,唐朝政府还以和市、宫市为名,购买种类繁多的生活与生产物资。开天年间,长安有配户和市制度。安史之乱后,和市、宫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皇室和政府所需要的物资,经常通过购买得来。

(二) 北方边境地区

唐朝的北方(西北、东北)边境随着国力的盛衰,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但终唐一代,北方边境地区始终是政府购买物资的重要区域。一方面,政府购买粮食为边军提供物资保障;另一方面,这一狭长区域,是唐朝政府获取马、牛、羊等畜类的最主要来源地。北方边境地区购买的粮食、马匹等,是盛唐强盛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对于平定安史之乱,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贞观四年(630),张俭首先在西北边地实行和籴。到开天年间,北方边境地区的和籴发展规模巨大,每年购买粮食的费用达 360 万匹段,主要涉及朔方、河西、陇右、伊西、北庭、安西等边境地区^⑥。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藩镇割据、河湟陷没,北方边境的粮食购买区域大幅向内地收缩。

唐朝绢马贸易的对象主要有突厥、吐谷浑、回纥、党项、吐蕃等。唐初,因战乱之后国马耗损,即向突厥、吐谷浑等市良马^⑦。太宗贞观年间,东突厥内附,唐与突厥的互市更加密切。到开元十五年(727),唐朝政府在西受降城设置了专门的绢马贸易市场,每年用数十万匹绢换取突厥马,西受降城成为马匹交易的主要场所。开元天宝年间,唐朝还在朔方一带开展互市^⑧。除西北地区外,“唐朝的更为可靠的马

①《新唐书》卷 50《兵志》,第 1339 页。

②《全唐文》卷 68 唐敬宗《令市耕牛诏》,第 716 页。

③《唐六典》卷 23《将作都水监》河渠令丞职掌条,第 600 页。

④《唐六典》卷 23《将作都水监》右校署条注,第 596 页。

⑤《唐会要》卷 59《尚书省诸司下·虞部员外郎》,第 1039 页。

⑥《通典》卷 6《食货六·赋税下》,第 111 页。

⑦“时中国经大乱,马耗,会突厥讲和,诏文恪至并州,与齐王诱市边马以备军。”见《新唐书》卷 88《赵文恪传》,第 3740 页。

⑧《新唐书》卷 133《王忠嗣传》:“初,在朔方,置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故蕃马寝少,唐军精。及镇河、陇,又请徙朔方、河东九千骑以实军。迨天宝末,益滋息。”见第 4554 页。

的来源是东北地区,即来源于渤海靺鞨、室韦和奚部落”^①。开元十九年(731),唐朝还在与吐蕃交界的赤岭地区设立了类似的贸易机构^②。唐代引进马匹 83 种之多,其中北部地区有 28 种,西部地区有 34 种,东北地区有 8 种,西南地区有 3 种,地域不清楚的有 10 种^③。唐朝在营州、幽州、西受降城、云中、朔方、河东、安西等地开展互市,大规模购买马匹,对于改良马种、增强军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后,唐朝与回纥开展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尤其代宗大历年间,唐朝向回纥购买马匹,“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④。除了常规性的马匹购买,唐朝政府还会根据需要适时大规模购买马匹,如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⑤。

除中央政府购马外,北方地方政府和军镇,还不定期地向边境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以供军政需要。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地方政府买马的大量记载。如 P. 3559 号《天宝十三载(754)敦煌郡会计牒》载,天宝六载节度使为乌山等四戍购置马一百匹^⑥。阿斯塔那 506 号墓《唐天宝十三载(754)后请处分诸馆马料牒》称:“依检天十二载诸馆帖马斛斗二千石,前太守药用充和朵添将市马。”^⑦

北方边境是唐朝政府购买牛羊等畜类的主要地区。武德八年(625),唐朝政府就开始通过互市购买牛羊。开天年间,唐与突厥在西受降城设立互市,大规模用绢帛购买牛羊。开元九年(721),玄宗在赐给突厥的诏书中称:“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⑧

政府大规模购买牛羊,有时是为了解决物资运输的畜力问题。如在西州,长运坊负责官府和军队物资的运输。长运坊的牛由于常年死损,需经常购买补充。大谷文书 3786(1)号《唐开元十二年前后西州用练市牛簿》就有西州都督府大规模用练买牛的记载^⑨。

此外,肃宗乾元年间,唐朝政府还曾在西北地区和市縠布,这应该主要是为了满足平定安史之乱的需要。

(三)黄河中下游地区

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东道、河南道、河北道是唐朝的经济重心,唐朝政府在这一地区购买的物资主要是粮食。政府购粮主要供常平仓使用,河东道购粮还曾一度支援振武等边军,但对缓解关中粮食短缺问题助益不大。

河东道是唐朝政府最先购买粮食的地区之一,唐朝建国之初,主要就是在关中、河东等地购买粮食。开元二年(714),全国建立了常平仓制度,河南、河北、河东诸道普遍设立常平仓。开元七年(719),又设立了常平仓本钱^⑩。政府购粮除供常平仓使用外,河东地区购买的粮食还供给北方边军。“初,度

①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42 页。

②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论尚它碑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见《资治通鉴》卷 213“玄宗开元十九年”第 6796 页。

③ 马俊民:《关于唐代“胡马”引进及其历史作用》,《天津师大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④ 《资治通鉴》卷 224“代宗大历八年”第 7221 页。

⑤ 《新唐书》卷 50《兵志》,第 1339 页。

⑥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464—465 页。

⑦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10 册,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53 页。

⑧ 《资治通鉴》卷 212“玄宗开元九年”第 6744 页。

⑨ 参见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47 页。

⑩ “[开元]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河东〕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见《唐会要》卷 88《仓及常平仓》,第 1613 页。

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汴河舟溺甚众。”^①河南等地的购粮规模更大。开元二十九年(741),唐朝政府曾在洛阳、关中地区各和籴数百万石。^②天宝年间,黄河中下游诸道每年都有固定经费购粮。“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③除了租税外,三道购买的粮食应当有一部分运往关中。天宝八载(749),河东、河西地区和籴粮 481979 石,占全国和籴总数的 42.30%;河北道、河南道、河东道常平仓储量分别占全国常平仓储量的 36.15%、26.35%、11.63%,其总量占全国的 70%左右^④。

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政府多次要求在河南、河东等道购买粮食,但受困于财政危机,常平本钱又没有稳定的来源,这些地区购买粮食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德宗贞元年间,由于受到吐蕃的威胁,也曾 在河南、河中等地购买粮食^⑤。宪宗元和元年(806),唐朝政府将地税的一部分划作常平仓本钱,黄河中下游诸道常平仓有了相对固定的资金。元和七年(812),唐政府购粮约 160 余万石,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完成的^⑥。

(四)江淮地区

唐朝政府在江淮地区购买的主要是土特产和手工业品,到唐后期,江淮地区的购粮也大规模发展起来。

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从开元年间起,唐朝政府开始大规模购买轻货。天宝年间,韦坚“乃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⑦,这些轻货主要是江淮地区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⑧。

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五琦“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⑨,江淮成为政府购买轻货的主要来源地。随着两税法的实施,唐朝政府经常以江淮地区的两税、盐铁收入购买轻货,运往长安。这是在租庸调制崩溃后,唐朝政府应对财政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政府购买的轻货除用于消费、赏赐之外,还经常充当和籴资金^⑩。唐朝政府在江淮地区购买轻货,主要集中于太湖周围和钱塘江南岸地区,尤其是昇、润、苏、杭、越、宣、常、湖八州。这八州发达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为政府购买创造了条件。

①《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第 1372 页。

②“〔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今岁秋苗远近丰熟,时谷既贱,则甚伤农,事资均籴,以利百姓。宜令户部部中郑昉、殿中侍御史郑章于都畿据时价外每斗加三两钱和籴粟三四百万石,所在贮掌。……其关辅委度支郎中兼侍御史王翼准此和籴粟三四百万石。”见《册府元龟》卷 502《邦计·平籴》,第 6012 页。

③《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第 1373-1374 页。

④《通典》卷 12《食货一二·轻重》,第 291、293-294 页。

⑤“贞元二年九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华、陕、虢、晋、绛、郾、坊、丹、延等州府,夏秋两税、青苗等钱物,悉折籴粟麦,所在储积,以备军食。京兆府兼给钱收籴,每斗于时估外,更加钱纳于太仓。’诏可之。”见《唐会要》卷 90《和籴》,第 1636 页。

⑥“元和七年七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奏:今冬诸州和籴贮粟,泽、潞四十万石,郑、滑、易、定各一十五万石,夏州八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以今秋丰稔,必资蓄备,其泽、潞、易、定、郑、滑、河阳,委本道差判官和籴,各于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民知劝农,国有常备。”从之。见《唐会要》卷 90《和籴》,第 1637 页。

⑦《旧唐书》卷 48《食货志上》,第 2086 页。

⑧《旧唐书》卷 105《韦坚传》,第 3222-3223 页。

⑨《资治通鉴》卷 219“肃宗至德元载”第 7001-7002 页。

⑩如“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青、楚、海等州的盐税纳于官府,再由官府以此钱购买绢帛等输纳司农寺。这些州主要集中于江淮地区。轻货还可以用来作为和籴资金。《全唐文》卷 47,唐代宗《命诸道入钱备和籴(余)诏》:“边谷未实,戎备犹虚,因其天时,思致丰积,将设平籴(余),以之餽军。然以中都所供,内府不足。粗充常入之数,岂齐倍余之收。……每道据合配防秋人数多少,都计钱数,市轻货送纳上都左藏库,贮以纳充别籴和籴(余)用。”

唐代中后期,江淮地区的金银贸易非常繁荣。“扬州在盛唐后的贸易地位,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银集散地,淮南道等是中央朝廷金银器的供应地。”^①江淮地区也成为唐朝政府购买金银的重要来源地,如敬宗时诏浙西造妆具,造器所须用银,就是从扬州购买的^②。

在粮食方面,江淮义仓米折造对于唐朝财政影响很大,但江淮不是唐朝政府购买粮食的主要地区。开元二年(714),天下诸州设常平仓,但江淮地区因为不堪贮积,并未设立^③。开元七年(719),关内、陇右、河南等地普遍设立常平仓,江淮地区仍未列入其中^④。江淮购粮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不大,天宝八载(749),淮南道常平仓购粮仅占全国常平仓总量的1.76%^⑤。

唐中后期,江淮地区的粮食购买日益重要。德宗兴元元年(784),因岁收丰稔,诏令度支于淮南、浙江东西道和采。元和元年(806),唐政府将地税的一部分划作常平仓本钱,江淮诸州常平仓有了相对固定的资金,为常规性的粮食购买创造了条件。

(五)岭南地区

岭南对于唐朝政府有特殊意义,它是海外奢侈品输入的最重要的集散地。为搜求珍宝,满足奢侈消费的需要;同时,为抽取“舶脚”,增加财政收入,唐朝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高宗显庆六年(661)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⑥唐朝政府在广州等地大规模地购买药材,突出地表现为香料的购买。“当时海外蕃舶输入的蕃货,以香药(沉香、檀香、甲香、檐糖香、龙涎香等)、象牙、犀角、珍珠、毒瑁、琉璃,以及贝类等为主,其中尤以香药及象牙最多。”^⑦唐朝从外国输入的香料有沉香、紫藤香、榄香等数十种。

唐朝政府还通过对外贸易,大规模地从国外引入稀有木材,以供给社会上层奢侈生活的需要。“为了维持这种挥霍奢侈的场面,同时也为了国家庄重的礼仪大典的需求,宫廷工匠需要有大量的印度群岛的稀有木材,结果这种木材通过唐朝安南羁縻地区和广州的大海港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唐朝境内。”^⑧输入唐朝的稀有木材,主要有紫檀、桐木、白檀、香檀等。

(六)西南地区

剑南道是唐朝的战略总后方,唐朝政府在这一地区购买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和绢帛。开元二年(714),天下诸州遍设常平仓,但剑南道因下湿,并未设立。开元七年(719),西南地区夔、绵、益、彭、蜀等州,普遍设立了常平仓,并专门设立了常平仓本钱。到天宝八载(749),剑南道常平仓购粮仅占全国的1.54%^⑨。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黄河中下游等地区的粮食购买被迫中断,但剑南地区的粮食购买仍然进行,为政府的平叛战争提供了物质支持。唐中后期,随着常平仓本钱的设立,西南地区的粮食购

①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② 见《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4511-4512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二年”:“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见第6705页。

④ “[开元]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河东〕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采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见《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第1613页。

⑤ 《通典》卷12《食货一二·轻重》,第293-294页。

⑥ 《唐会要》卷66《少府监》,第1156页。

⑦ 曾一民:《李唐对岭南之经营》,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2-163页。

⑧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第294-295页。

⑨ 《通典》卷12《食货一二·轻重》,第291、293-294页。

买有了相对稳定的资金。

唐代剑南道的绢帛制造业最为发达,“唐天宝间西南地区绢帛年产量近 800 万匹”^①。唐朝政府曾在剑南等道大规模地购买绢帛,以满足供国、供军的需要。“唐前期剑南道,主要是成都平原地区向陇右、河西以及沿途邮驿提供大量粮食、布帛,主要供给西北边军所用。而向唐朝府库主要是提供珍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剑南米粟和布帛也起了重大作用。”^②

二、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流向

限于自然条件,唐朝政府购买物资,最大可能地着眼于就近购买、就地使用。但粮食、手工业品等大额重要物资,仍需要克服地域限制,运往需要使用的地区。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流向,主要有购买地本地使用、购买地——长安、购买地——边境或战场三种类型。

(一)购买地就近使用

政府和军队购粮,首先考虑的是就近购买的原则。从唐前期开始,政府出于军事需要,在西北边境购买粮食,以满足军队的粮食需求^③。关中地区,尤其京师长安附近,也是政府购粮的重要区域。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和籴大规模推行于关中。就近购买,就地使用,既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经济条件,又减少了运输损耗。安史之乱后,唐朝受到吐蕃的严重威胁,西北边防形势严峻。自代宗大历年间之后,唐朝在长安附近部署十几万“防秋兵”,以防御吐蕃入侵,其军粮基本靠就近和籴解决。如德宗贞元初,受吐蕃威胁,“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诸道戍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于关中”^④。

常平仓购粮也是就近购买、就地使用。唐朝设置常平仓,除了经营目的之外,还为了赈济灾荒。开天年间,天下诸州遍设常平仓。安史之乱后,由于受到经费的制约,各州常平仓始终未能有效运转,直到宪宗元和元年(806),唐朝政府将地税的一部分划作常平仓本钱,天下诸州常平仓有了相对固定的资金。常平仓就近购买,就地使用,既有效地增加了政府仓储,又增加了政府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

满足宫廷消费需要的和市与宫市,主要是在长安附近进行。开天年间,长安有配户和市制度。安史之乱后,和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生活物资,官府手工业生产所需原料也改以和买为主。德宗时,宫市的范围空前扩大,宫廷与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和市、宫市的发达,主要依靠的是长安地区繁荣的市场。

唐朝政府、军队所用的官马、承直马、六驮马等主要由政府购买而来,战马、驿马也有相当数量通过购买,这些马匹主要是由当地政府就近购买。除了常规性的马匹购买,唐朝政府还会根据需要就近大规模购买马匹,如德宗建中元年(780),“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⑤。此外,为了解决畜力问题,政府还会就近大规模买牛。如在西州,长运坊负责官府和军队物资运输的牛由于常年死损,需经常购买补充。

政府购买铜、铅、锡等矿产,主要就近送往各铸钱监或官府手工业作坊,以供生产使用。建筑业、陶瓷业等官府手工业需要使用大量的土、砂、石灰等,这些非金属资源主要是就近购买解决的。

此外,各级政府为保证政务运转所必需的公厨杂物、馆驿杂物、纸笔等,也是就近或就地购买解决。

① 卢华语:《唐天宝间西南地区绢帛年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② 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7 页。

③ 参卢向前:《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二》,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羨林教授八十年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④ 《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第 1374 页。

⑤ 《新唐书》卷 50《兵志》,第 1339 页。

(二)购买地——长安

唐朝政府购买物资,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供给宫廷、中央政府使用。因此,从外地购买运往长安的,主要以珍奇、宝货等为主。

唐朝政府购买轻货,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其主要流入地就是长安。开天年间,杨慎矜“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矣”^①。“又有韦坚,规宇文融、杨慎矜之迹,乃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②天宝中,杨国忠把变造之法推广到全国各州县仓库、丁租、地税,用以购买轻货,“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巢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③安史之乱后,随着两税法的实施,唐朝政府经常以江淮地区的两税、盐铁收入购买轻货,运往长安,如“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④。

唐朝政府在广州等地大量购买海外珍奇,“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⑤。少府监在广州等地购买的香药等物资,要运往长安,以满足中央政府生产、生活的需要。

地方送往长安的土贡,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购买的。“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匹,并以官物充市。”^⑥别敕索物由尚书省下符、左藏支付价值购买。购买的物资,要运往长安,以供少府监所辖官府手工业使用。“凡五署所修之物须金石、齿革、羽毛、竹木而成者,则上尚书省,尚书省下所由司以供给焉。”^⑦此外,唐代宦官、大臣时常奉敕出使,于全国各地访求名贵珍异之物,如马匹、鹰犬、食物等,以供皇室消费。使节出使访求异物,往往由地方政府购买上贡。

唐朝互市所得良马,要遣使送往长安。“上马送京师,余量其众寡,并遣使送之,任其在路放牧焉。”^⑧

天下诸州运往关中的粮食主要是赋税所收,而非购买得来。但在某些时期,诸州购粮有些也运往长安。“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⑨开天年间,诸道购粮中约有 100 余万石运往长安使用。

诸州出产的金银,除税收之外,“其一部或全部亦有归政府收买者”^⑩。通过税收、购买等方式,唐朝政府把金银大量集中到中央政府,铸为铤、饼等形式保存,从而为官府手工业提供原料。

(三)购买地——边境或战场

政府购粮的一个重要去向是北方边境地区。从唐朝前期开始,政府就在西北边境购买粮食,以满足军队的粮食需求。但北方边境和籴的粮食往往不敷使用,时常需要从剑南道、河东道等地购买支援。陈子昂《上蜀川军事》:“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⑪唐前期剑南道(主要是成都平原地区)向陇右、河西以及沿途邮驿提供大量粮食、布帛,主要供给西北边军使用。此外,政府还需要从太原附近购粮,以支援北方诸军。“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太原),以赡振武、天德、灵

①《旧唐书》卷 105《杨慎矜传》,第 3226 页。

②《旧唐书》卷 48《食货志上》,第 2086 页。

③《资治通鉴》卷 216“玄宗天宝八载”第 6893 页。

④《新唐书》卷 54《食货志四》,第 1377 页。

⑤《唐会要》卷 66《少府监》,第 1156 页。

⑥《通典》卷 6《食货六·赋税下》,第 112 页。

⑦《唐六典》卷 22《少府军器监》少府监丞条,第 572 页。

⑧《唐六典》卷 22《少府军器监》诸互市监条,第 580 页。

⑨《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第 1373-1374 页。

⑩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华书局,2006 年,第 436 页。

⑪陈子昂:《陈子昂集》卷 8《杂著》,徐鹏校点,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75 页。

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溯河舟溺甚众。”^①

政府购买粮食，除了供给京师、边防军队的需求外，在开天年间，还有一部分供给陇右监牧系统。监牧系统马料费用，主要依靠官户垦田、屯田，但仍有近 200 万石的差额。这个差额的补充，主要依靠政府拨款购买。天宝年间，每年拨付陇右监牧 40 万匹段余米粟^②。此外，还有户税钱作补充，“六十余万添充诸军州和余军粮”^③。天宝年间，每年以 60 万贯钱和余，购买约 200 余万斛粮食，其中输入京仓百余万斛，其余近百万斛补充陇右诸牧监马料。

除了购买物资以支援边境诸军外，唐朝政府还经常转运购买的物资来支援战场。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两京府库落入敌手，缺乏军赏，第五琦曾于肃宗至德元载（756）“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④，这是为了提供军资，满足平定安史之乱的军事需要。不仅如此，剑南道购买的粮食和布帛也被运往战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剑南米粟和布帛也起了重大作用”^⑤。除了粮食，唐朝政府还会适时购买马匹、牛羊，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如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⑥。

此外，唐朝政府有时会将购买的粮食，运送其他州县支用。如唐后期，为保护江淮财赋，维持唐朝生命线，唐朝政府曾在江西、湖南等地购粮，运送至江淮地区使用^⑦。

三、唐朝政府转运购买物资的主要运路

（一）入京物资运路

1. 漕运主干线

天下诸州供给长安的购买物资（尤其是大额物资），通常利用漕运主干线。日本学者清木场东将其总结为：“山阳（杨子—淮阴）、淮水（淮阴—临淮）、汴河（临淮—汴口）、黄河（汴口—洛口）、洛水（洛水—洛阳）、漕渠（偃师—洛阳）、北路（洛阳—陕县=太原仓）、黄河（陕县—渭口=永丰仓）、渭水（渭口—长安）”^⑧。唐朝政府在东方诸道购买的物资，需转运长安者，主要利用这条漕运路线。为了充分发挥漕运效力，唐代对于漕运路线，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开凿、疏浚和整理，包括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三治江南运河等^⑨。

一是洛阳以东运路。唐前期，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物资转运格局。租粮、购买的物资等，均要由东都转运。在江淮、岭南等地购买的轻货、珍奇，先运至扬州，以扬州为中转站差纲押运至洛阳。P. 2507《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水部式残卷》：

①《新唐书》卷 43《食货志三》，第 1372 页。

②《通典》卷 6《食货六·赋税下》：“其费余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河东节度使及群牧使各四十万。）”见第 111 页。

③《通典》卷 6《食货六·赋税下》，第 111 页。

④《资治通鉴》卷 219“肃宗至德元载”，第 7001-7002 页。

⑤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 57 页。

⑥《新唐书》卷 50《兵志》，第 1339 页。

⑦《全唐文》卷 60 唐宪宗《赈贷淮南浙西诏》：“淮南扬、楚、滁三州，浙西润、苏、常三州，今年旱歉尤甚，米价殊高。言念困穷，岂忘存恤。宜以江西、湖南、鄂岳、荆南等使折余米三十万石赈贷淮南道三州，三十万石贷浙西道三州。”见第 643 页。

⑧[日]清木场东：《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编》，第 66 页。

⑨参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 年。

78 ○桂广二府铸钱,及岭南诸州庸调,并和市折租

79 等物,递至扬州讫,令扬州差纲部领送都,应须

80 运脚,于所送物内取充,^①

扬州到洛阳,主要靠水运,水程约有 1720 里^②。开元二十二年(734),唐政府对转运仓布局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以河阴、太原、永丰三仓为枢纽的新布局^③。安史之乱后,漕运路线屡遭破坏。广德二年(760),刘晏加强了长江—漕渠(邗沟)、汴河—黄河、黄河—渭水等三个交汇处的转运仓的建设,形成以扬子、河阴、永丰三仓为枢纽的转运线^④。

二是陕洛运路。洛阳距长安 800 余里,其中洛阳、陕州间 300 里的运输最为困难。高宗显庆元年(656),苑西监褚朗曾调发 6000 多人在砥柱东侧凿石开山,拟修一条山路以通牛车,避开三门天险,未竟而止。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在三门山开凿栈道。陆路运费昂贵,由洛阳运米至陕州,每石需钱 1000 文。开元初年,河南尹李杰为陆运使,曾经改善这段陆路运输,从洛阳含嘉仓至陕州太原仓,设置八递场,每递场用牛车 800 乘。

开元二十二年(733),裴耀卿主持漕运,采取褚朗凿山为梁的方法,“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⑤。又于三门东西各置一仓,以作车船装卸之用。由于运行不畅,三年后被迫废弃。开元二十九年(741),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挽路,烧石沃醢而凿之”^⑥。

德宗贞元二年(786),“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径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五万缗;下路减半”^⑦,以后,江南漕船大多经李泌所开的上下两路,转运京师。

三是陕州长安运路。长安附近的水路运输一直利用渭水。高宗咸亨三年(672),在东渭桥南端置渭桥仓,后又设河运院,组织粮食转运事务。“东渭桥地当水陆枢纽,漕粮既可在此改装小船,西输太仓,也可由陆路转运长安。”^⑧

除渭水外,天宝元年(742),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根据隋代广通渠旧渠,于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⑨。通过开凿漕渠与广运潭,漕运物资可以用船一直运往长安,不必再象以前那样用牛驾车来运送了。后来,这条渠道因受灞、浐二水盛夏暴涨的冲击,代宗以后渐不通船。文宗太和(827-835)初年,咸阳令韩辽又自咸阳到潼关间,凿兴成渠 300 里,渠成后,关中运粮“无车挽之劳”。

此外,唐朝政府还在长安附近开渠,用于运输木材。武德八年(625),水部郎中姜行本沿汉代成国渠旧路开通升原渠。“大唐咸亨三年,于岐州陈仓县东南开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城。”^⑩

①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第 581 页。

② 清木场东:《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编》,第 81 页。

③ 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上书:“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泝河,更无停留,所省钜万。”见《旧唐书》卷 49《食货志下》,第 2115 页。

④ 《资治通鉴》卷 226“德宗建中元年”载刘晏的转运策略:“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口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授给。”

⑤ 《旧唐书》卷 49《食货志下》,第 2115 页。

⑥ 《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第 1367 页。

⑦ 《新唐书》卷 53《食货志三》,第 1370 页。

⑧ 辛德勇:《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 1 辑;收入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67 页。

⑨ 《旧唐书》卷 9《玄宗纪下》,第 216、216-217 页。

⑩ 《通典》卷 10《食货十·漕运》,第 221 页。

“垂拱初运岐、陇水(木)入京城。”^①天宝元年(742),为了往长安运送木材,京兆尹韩朝宗分渭水入金光门,在西市置潭以贮材木。盛唐时期,长安土木建造频繁,而长安附近缺乏巨木,须远至岚、胜二州采伐或购买,这些木材有一部分当由金光门水运而来。

2. 汉沔运路

除大运河外,唐代还有一条重要的漕运路线,即汉沔运路。“唐世,关中中原南通江淮岭南有东西两大交通干线。东线取汴河水路至扬州,西线取邓襄陆路至荆、鄂。襄阳当西线陆路与汉水水运之交会处,得西通汉中,尤为枢纽。……物资集中于襄阳后,因军事情势关系,不一定取道南阳武关运送上都,而往往向西北取道上津,称为上津路。上津路北通商州,西通洋(今洋县)梁(汉中,今南郑)。”^②

当中原发生战乱、运河阻塞不通时,汉沔一线就成了沟通东南的唯一通道。安史之乱时,萧颖士曾指出:“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③到唐后期,汉沔运路成为唐朝物资运输的一条重要生命线。代宗广德初年,“是时河运不通,漕輓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④,此时购买物资往往由汉沔运路运至襄阳,再取商山道输入长安。

3. 长安附近的陆运路线

限于长安的自然条件,有些物资,尤其绢布等轻货,其运输往往不走水路,而是经由陆运。唐开元初张说领幽州,“每岁入关,辄长辕輓辐车,犂河间、蓟州庸调缣布,驾轹连輓,垒入关门”^⑤。其他调物如麻等往往也是陆运入京^⑥。

唐朝建立了完善的陆路交通线,唐朝政府购买的物资由陆路入京,就通过这些交通线。据辛德勇先生研究,“长安附近交通网络中主要道路有四条,即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和渭北道”^⑦。而据严耕望先生研究,直接通长安的陆路交通线至少有12条^⑧。政府购买的物资经多段路途的运输后,最终经通化门或春明门进入长安城^⑨。

4. 岭南至长安运路

海外的香料、药材等奢侈品,由广州、交趾等地入关,几经转运,运往长安。这些海外输入的奢侈品,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运河,在扬州差纲押运;还有一部分经由陆路。岭南通往长安的陆路运输线主要有三条:虔州大庾岭路、郴州骑田岭路和桂州越城岭路^⑩。在交州往京都方面的交通,则有“交趾道”,即南海各国经交州,入广西,取桂州路,经灵渠,转运入长安。

(二) 非入京物资转运线

① 《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凤翔府宝鸡县注》,第967页。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 秦岭仇池区),台湾商务印书馆、学生书局、三民书局,1985年,第801页。

③ 《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第5769页。

④ 《旧唐书》卷155《穆宁传》,第4114页。

⑤ 《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中华书局,1961年,第3994页。

⑥ 《朝野僉载》卷6王无导条:“帝笑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麻(庸)车三日,并与之。导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见张鷟撰:《朝野僉载》卷6,中华书局,1979年,第149页。

⑦ 辛德勇:《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收入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177页。

⑧ 长安洛阳驿道、长安太原驿道、长安灵州驿道、长安丰州驿道、长安胜州驿道、长安凉州驿道、唐通回纥道路、蓝田武关驿道、子午谷道、骆谷驿道、褒斜驿道、天宝荔枝道。

⑨ 辛德勇:《唐长安都亭驿考辨——兼述今本〈长安志〉通化坊阙文》,《唐史论丛》第1辑,1988年;收入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116页。

⑩ 曾一民:《李唐对岭南之经营》,《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9-160页。

唐代没有大规模修建全国性的道路,而是沿用隋代旧路,并时常加以保养维修。政府购买物资在诸州、诸军之间的转运,即充分利用了发达的水陆交通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建立了完善的仓廩转运线,全国呈现普遍置仓与诸仓协调的仓廩布局结构。“在诸仓运营过程中,布满全国的正仓和义仓之网,通过无数条小转运线和转运干线与太仓(含嘉仓)相沟通;而在唐朝疆域的周边,则镶嵌着一条屈曲萦回的军仓供应线,……”^①唐朝政府购买粮食的转运,充分利用完善的仓廩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快速、高效地将粮食转运至需要使用的地区。

综上所述,唐朝政府购买物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主要集中在关中、北方(包括西北、东北)边境、黄河中下游、江淮、岭南,呈现出以关中为中心,东南、西北并重的局面。关中是唐朝政府购买粮食等战略物资的主要地区,和市、宫市也主要集中在长安。北方边境地区的购粮对于支持边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唐朝政府获取马、牛、羊等畜类的主要来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政府购粮主要用于常平仓,此外河东道还曾支援北方振武、天德等军。江淮是唐朝政府购买土特产和手工业品的主要地区,唐中后期,粮食购买也有所发展。岭南地区是唐朝海外奢侈品的集散地,唐朝政府建立了在广州购买海外奢侈品的制度,并且设使进行管理。剑南等地购买的布帛和粮食曾用于支援陇右、河西诸军,对于平定安史之乱,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流向,主要有购买地本地使用、购买地—长安、购买地—边境或战场三种类型。用于购买地本地使用的,主要有粮食、马匹、矿产、和市物资,以及维持政务运转的公厨杂物、馆驿杂物、纸笔等。运送长安的物资,主要有江淮轻货、海外珍奇、诸州贡物、金银和诸州购买的部分粮食。转运边军或战场的,主要是粮食、轻货、牛羊等,用于充当军资。

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运路主要有两种。入京的物资一是充分利用漕运路线,二是利用长安附近发达的陆路交通运输线。非入京的物资则充分利用唐代各地发达的水陆交通线和完善的仓廩系统,实现购买物资的有效转运。

[参 考 文 献]

- [1] 宁欣. 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J]. 历史研究, 2004, (6).
- [2] 岳纯之. 关于唐代市场的几个问题[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6, (1).
- [3] 乜小红. 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4] 吕岩. 唐朝政府物资购买领域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 (5).
- [5] 马俊民. 关于唐代“胡马”引进及其历史作用[J]. 天津师大学报, 1988, (4).
- [6] 卢华语. 唐天宝间西南地区绢帛年产量考[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7, (4).

^① 张弓:《唐朝仓廩制度初探》,第144页。